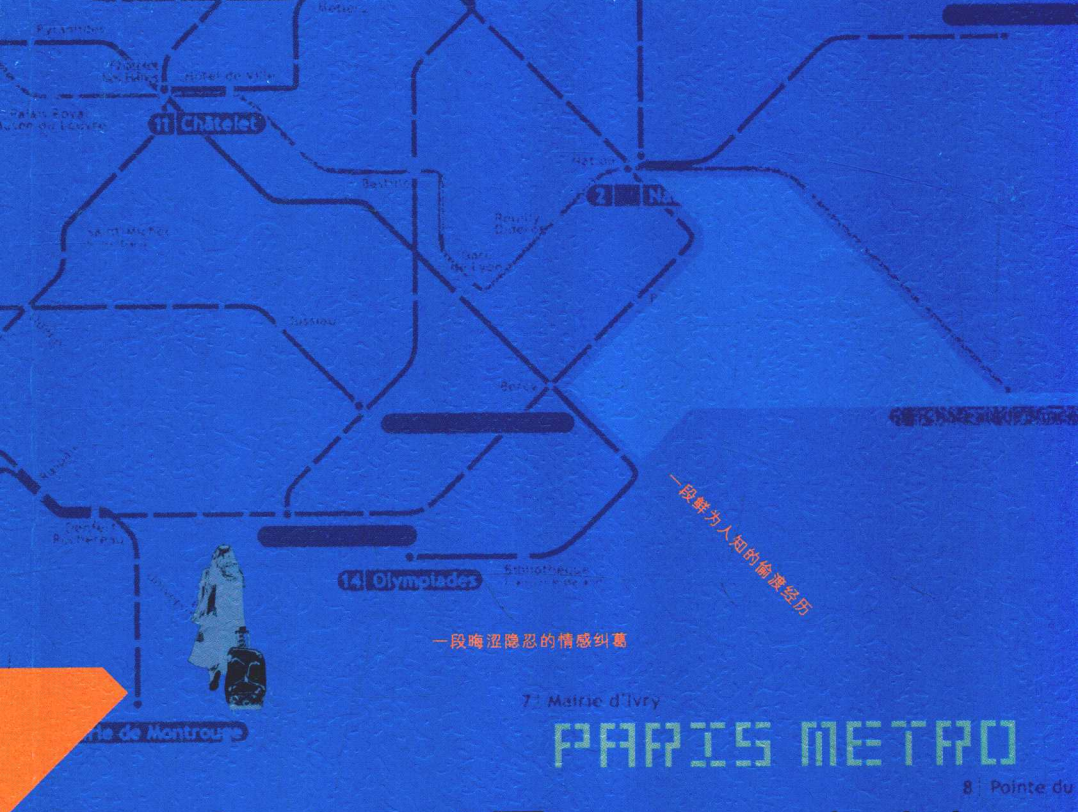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巴黎地铁

姚中彬 著

一个异国他乡的寻梦之旅

一场青春困惑的悲喜离合



文艺出版社
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巴黎地下铁

姚中彬 ---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地下铁 / 姚中彬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00-3098-5

I. ①巴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7665号

巴黎地下铁

姚中彬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赵 霞 许 复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7
版 次	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098-5
定 价	37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44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在异国他乡漂过或漂着的人

十六年前的他，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，后来不知道怎么从体育课代表变成了我的语文课代表。

那时我让学生每天写日记，即使实在没有话说也写上“今天无话可说”。日记上有前言，有后记，俨然是他们自己的出版物。另外每节课前有名言推荐，每周有文学欣赏课。那是座乡村中学，学生们大都很腼腆，上了讲台面红耳赤，不知所言。不过不到一个学期，他们就乐此不疲了。其中上讲台次数最多的就是他了。

正是那年，我离开了那曾经誓言终生不离的讲坛，一别不返。

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班的学生为我举办的欢送会，并且至今保存着他们给我录制的告别磁带。

我们亦师亦友，一直保持着淡如水的联系。从他进高中，去北方读大学，然后远渡重洋，然后回到家乡，其间偶尔书信来往，偶尔接到他的越洋电话，也偶尔小聚举杯畅谈。最近一次收到他的明信片是他从马来西亚机场寄来的。他告诉我去印度出差遭遇了恐怖袭击，有幸躲过一劫。他说，平淡的幸福才是最真实美好的。

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整齐地放着他在国外所写的小说，有前言有后记。合上书稿的时候，时光倒流，仿如十六年前合上他交上来的那本日记，那个顽皮的男孩顿时浮现在我脑海里。

时间真是个让人容易忽视的东西，想起它时，已经十余载过

去了。

他在巴黎的时候，已经顺利就读于商学院，这之前他付出的艰辛是为许多同龄人所不及的。记得电话那头他常对我说：“法国虽浪漫，但这个国家的浪漫从来没属于过自己。”

懂得记录、总结、反思并且表达生活的人，才是认真生活的人。期待着这本书能给读者以小说之外的一些思考。

这是他第一次出版小说，也是我第一次为他人作序。

心里充满着期待。

陈志良
2009年8月 于江苏常州

两个月前，匆匆路过巴黎，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朦胧依稀。

彼时正逢巴黎的秋，满大街都是黄绿斑驳的法国梧桐。街头走过三三两两的中国留学生和各种肤色的人们，他们爽朗的笑声飞扬在四周，眸子里透露出灵动的斑斓，正如绚烂秋色。

站在巴黎街头，脚下时则会觉出些震感，耳侧拂来轰隆隆的声响，这是地铁开过时哐当哐当的跃动音律。

始于十九世纪的巴黎地铁，数百年来奔驰不息。那些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，那些沧桑古旧的车厢，既见证了法兰西工业时代的辉煌，透露着浪漫之都的风土人情，也记录了这个城市数百年来无数故事。《巴黎地下铁》的作者姚中彬是本世纪初旅居巴黎的游子，他试图讲述的是在改革开放后，大量中国人涌入海外的宏大时代背景下，其中一个中国年轻人出国寻梦的小故事。中彬出生在江南，成长于长江之畔“下滩”地区的一个小村庄，留学和工作到了时尚之都法国巴黎。在他的作品里，既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，也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融合，更有人性之美与价值之美的相互贯通。我和中彬相识十多年，引为至交。他外形清瘦、冷面，喜欢调侃和玩笑，可一旦与他交往，便能感受到轻松美好、实在可靠和一种柔韧的力量。在现实世界里，他并非无忧

无惧，但仍然乐观面对，披荆前行，他在作品中的精神表达与内心世界是一致的。《巴黎地下铁》这个“小故事”，曾在法国、荷兰出版，甚至成为比利时鲁汶大学中文课堂读物，作者本人也多次获邀赴法国、荷兰、比利时及港、澳多地召开读者见面会。文化无国界，这也体现出新侨“讲好中国故事”的独特优势吧。

移动互联时代，资讯扑面而来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可愈是这样，我们愈是需要停下来认真复盘和理性观想。

宁静，方能致远。

创作，正是对生活的概括、提炼和升华。

期待中彬坚持热爱，笔耕不辍。

李音强
2018年11月18日

我叫纪国庆。

二十六岁。

我不喜欢我的名字，它是上个世纪最俗气的名字之一，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是十月一号国庆节出生，我也不例外。何况我姓纪，纪念国庆，你说俗不俗吧。我为自己和一大堆的国强、国栋、建国一起长大感到悲哀。

我不喜欢这名字还有个原因，这和我的身份很不相符。

我自小就是个混混。

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看香港的警匪片。我经常幻想这样的场景：我露出粗壮的胳膊，上面文了一条蛇，小弟们看到我走过来便一起喊我，彪哥，我则看都不看他们，毫不在意地走过去。

然而我叫纪国庆，既不匪气也不霸气，这比我手臂没有肌肉更让人恼火。

我也不喜欢我出生的年代，一九八〇年，改革开放之后的两年。我从小到大见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种现象，九十年代初股票热、房地产热，然后是学校扩招，文凭贬值。

说到文凭，我父亲经常以自己是高中生而自鸣得意，夸夸其谈。他那时候高中生是有文化的象征，后来教育产业化了，上大学的多了，大学生不值钱了，现在研究生多了，也不值钱了，留学生

也多了，也不值钱了。

这个世界什么一多就不值钱了，这是我迄今得出来的最让我沾沾自喜，并且喜欢到处推销的一个结论。

幸好我没考上大学，没考研究生，更没有出国留学，否则念了十多年书到头来还是落个不值钱，那样不值钱还不如现在这样不值钱，这样我心里反倒平衡了。

我的那些名字同样不值钱的哥们儿却对我羡慕得要死，不是别的，只是因为我在巴黎。

巴黎，这名字听着就洋气。巴黎，法国，欧洲，在他们心里这些可都是浪漫的代名词。那些哥们儿在国内羡慕得不行了，并且以为这里的洋妞遍地等着你钓，甚至主动过来约你请你喝咖啡然后带你回家。我因为他们的羡慕而洋洋得意，经常买了中国卡在公用电话亭一个电话打到国内去。

“喂，靠！干嘛呐？”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“还在巴黎啊。”

“靠，不去泡妞多浪费啊！”

“哎，总要休息休息吧！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给哥们儿打个电话啊，别发了财忘了兄弟啊！”

“哦，不会不会。”

我满口答应，弄得真有那么回事似的。挂上电话我会狼吞虎咽地咬手里硬邦邦的长棍面包，嘴里骂道：“妈的，都以为这里有金子捡呐！我靠！”

有时候他们追问我睡过外国女人没有，开始我还实话实说，后来我发现说完之后他们的态度会马上冷淡下来。终于有一次我对电

话那边说：“昨晚刚在酒吧钓了一个洋妞。”

我的话马上被打断——

“长什么样的，金发碧眼的那种？”

“是啊，身材那个棒啊！”

“胸很大对吧？”

“嗯，确实大。”

“感觉怎么样的，你讲讲！”

“这个嘛，不好说啊，要你自己体会……”我听得到电话那边有咽口水的动静，故意吊起他们的胃口。我知道他们有多想听细节，电话那边一定是眼睁得大大的等着我描述，可他们不知道我自己都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突然觉得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和别人一起意淫是多么可怜，我便顿了顿嗓子，停了下来，对电话那边说：

“我走啦，有人打我手机了，去谈个生意上的事情，挂了啊！”

这种事情屡试不爽，我都说腻了，不过每次他们转弯抹角又会说到这个话题，我避而不及。

我总给国内的狐朋狗友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孤单。

虽然来巴黎才三个月，我觉得已过了三年，每天在地下室的厨房站一天，从天亮到天黑，唯独中午吃完饭后休息的时间能出来透气。电话越打我越觉得没劲，那些花花故事都是编出来吊他们胃口的，晚上回到屋里还是和搭铺的人一样，暗地里自慰，然后疲倦不堪地睡去，日复一日。

我坐地铁一个半小时才到上班的地方，从巴黎的这一头坐到那一头，然后钻进厨房，一天都看不到光亮。

我觉得压抑，这种压抑比性压抑更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我出生在江苏盐城，十四岁的时候全家人迁到南京。在江苏有个怪现象，苏南和苏北分得很清楚，苏南人被苏北人称为江南蛮

子，苏南人则喊苏北人为江北人，江北人这个称呼本身就带了歧视色彩，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北人。

我开始成为小混混是在初中的时候，我暗恋班里的一个姑娘小玉，她祖籍苏州，我喜欢听她细声细气并且带点嗲的普通话，我上课的时候常常偷看她，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下课时惊慌失措地给她传了个纸条，这是我琢磨了好几天写出来的，其实是一大段拐弯抹角的废话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。

我眼睁睁看着她狠狠地把我的纸条以一个优美的弧线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听到她自言自语：“神经病！”

以后她再也没有理我。

我开始自娱自乐。可惜我对数理化毫不感兴趣，成绩很差劲。数学课上老师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常常突然停下来，大声喊道：“纪国庆！”

我停下正弄着前排女生头发的手，呆呆地看着秃顶的老师，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哎！”

同学们“哄”的一声笑了起来。

老师阴沉着脸说：“你给我站起来，你说说，下一步怎么做？”

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“我不会，等着您讲呢，都会了还要您干吗？”

老师的脸都气红了，摆出句江南口音的普通话：“不上台盘咯东西！”

然后我就慢悠悠坐下去了。

诸如此类的事情常有发生，我后来干脆挑衅地在他课上吃苹果，故意啧啧地发出声音，他拿我没办法。

终于有一天我被躲在外面瞄了半天的校长逮了个正着，这次我

没有什么好狡辩的了。

这事情后来被我爸爸用三条“中华”摆平了。逢年过节我爸爸会给学校领导送礼，直到我混到初三毕业为止。

我后来上了个技校，学了个在我看来还有点意思的手艺，厨子。

技校里面有得是狐朋狗友，我们成天在学校外面的酒馆喝酒，在租的房子里打麻将，在台球室和游戏室吞云吐雾地玩通宵。这期间我换了三个女朋友，找了五个姘头，所谓姘头就是偷偷摸摸的勾当，对外宣称是这样，不过说老实话，打个折扣下来，其实就有过一个女朋友，一个姘头最后一刻还没姘成。

这个事情后来成了他们嘲笑的把柄。

我有几个死党，其中两个山东人，王刚和庆松；一个福建人，小许；一个东北人，张建东。他们都好酒，最重要的是性格豪爽，我虽然不胜酒力，也不甘示弱，不喝得吐出来好像就给江苏人丢脸了一样。

我们四五个人成天腐败不堪地生活，谁没钱了就一起翻其他人的口袋，直到大家口袋都翻不出什么名堂了，就躺在床上谈论其他班的女孩子。这样也觉得开心，标准的穷开心，可惜我们毕业之后就失去了这种开心。

我们的毕业是一场悲剧，我一直这么认为。

首先是，毕业了我们就各奔东西，再也没有聚到过一起。

其次是，一年之后的年头上，庆松离开了我们。

他死于车祸，酒后驾车。

他喝了那么多还逞强骑摩托车回家，他性子急，爱逞强，我们都知道，可惜这次不能大家一起教育他了。我们几个给王刚汇去了一些钱，一共凑了五千块钱，委托王刚带去了庆松老家，给他树了

一块碑。后来王刚经常说，他妈妈哭得太可怜了，听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心里特别难受，可是无能为力。

庆松的死对我们是个残酷的打击。

我们为生计各奔东西。王刚和小许都回了老家，王刚自己开了个小饭店，小许给人打工，在一个大酒店当厨师。张建东去了广州，音讯全无。

而我，则偷渡来了法国。

我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不愿向一般人叙述那段偷渡的经历。一是不安全，我走在街上看到警察就起鸡皮疙瘩，我担心哪天和别人吵了架被告发。二是我周围的人每天过着疲惫不堪的生活，做完工发完牢骚用手解决完生理需要就呼呼睡去了，谁会听我的废话。

然而在我心里，那大半年似乎是我的上辈子，现在的我，想起过去就觉得是重新活了一次。

说来也巧，我有偷渡来法国的主意，纯粹是偶然。

我起初不顾家里人反对，独自南下去了广州，在一个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份厨师的工作，待遇还不错。只是广州花花世界，我和厨房里几个年纪相仿的下了班就会出去溜达，几次一溜达口袋里的工资就没了，下面的日子就苦了。还好我们在厨房打工不怕没吃的，只是口袋里没有零花钱，买盒烟都要东拼西凑。

终于有一天，工友吴一凡对我兴冲冲地说：“我们出国吧！”

我从来没想过这个，问他：“怎么出？”

“我老家那边有专门送人出去的老板，到了国外才收钱，很安全的。只要到了那边，你小子就等着花洋票子吧！”

我听了心里痒痒的。问他：“需要多少钱？”

“十五万。”

我一愣，哪来那么多钱？

终于在一次和厨师长吵翻以后，我决定和吴一凡一起出国，他很快联系了老家那边的老板，说月底老板就派车子送我们去南宁。我打电话骗家里说我在广州打算买个二手房，爸妈把家里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给我寄了十八万。从邮局取钱的时候，我心想，这些钱我一定要赚回来的，不让父母失望！我留了十五万在银行账户里，把剩下的换成了美元带着身上。

做出偷渡出国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没有太犹豫。

“出来混哪有那么多顾虑的。”我常对自己说。

同时被接的一行人有七个，四男三女，另外两个男的，一个叫和尚，福建莆田人；还有一个叫李明德，东北人。女的里面一个已经四十几岁了，个子瘦瘦小小的，脸色不是很好，我们管她叫顾阿姨，另外两个有一个漂亮点的叫小兰，打扮土气点的那个叫阿霞。

我们第一次碰头的时候我就和吴一凡使眼色了，小兰是明白人，当然看得出我们的心思，好像故意躲着我们。

我们的出行线路是：从广州坐车去南宁，然后从边境爬山到越南，然后坐车去河内，从河内坐飞机到捷克，然后从捷克进德国，最后到巴黎。

到了边境，我们开始紧张起来，毕竟真正意义上的偷渡开始了。那天晚上天特别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到了山下我吓了一跳，除了我们这一拨，附近居然都是黑压压的人头。吴一凡告诉我这些都是今晚要从这里翻山过境的。

我们沉住气，等到带队的一声令下——“跑！”就背着行李拼命往山上爬，听到前面压着嗓子喝道——“趴下！”马上“哗哗”地，一大片人头都消失在黑暗里，只听到风吹过来，草和树枝呼呼作响。探照灯从我们头上扫过，我心里想，这估计比电影里的越狱还刺激呢！

三四个小时过后，我们已经筋疲力尽，顾阿姨身体不好，受了风寒，已经开始压着嗓子咳嗽了，小兰和阿霞一同轻轻拍着顾阿姨的背，大家都不敢喘气。

过了山顶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灯火了，心里觉得有希望了，又爬了大概两个小时才到一条盘山公路旁。这时候黑暗里蹿出一个人来，贼溜溜地对我们说：“天冷了哦，今天刮什么风啊？”

这是老板交代的接头暗号，我们对上以后，就随他上车。其他的人头似乎消失在山里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听到风呼呼地刮。

这是辆很破的轿车，天黑看不清什么牌子。他说车子小装不下，让我们再扔掉一些行李，我们就扔掉了一些到草丛里。车子后面坐三个女的，地上躺了和尚，李明德个子大坐前排，我和吴一凡蹲在后备箱，就这样，一辆本来坐五个人车子装了八个人，晃悠悠地在黑暗里前行。我觉得腿蹲麻了，都麻木得失去了知觉。

我身上一股青草味，手臂也被树枝刮破了，火辣辣的，我困顿不堪，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到了目的地的时候，我都站不起来了，躺在地上半天都缓不过劲来。小兰拽着阿霞的胳膊望着我们总算吃吃地笑了，她是笑话我们的狼狈相。我躺在地上，仰头望着青天，眼睛吧嗒吧嗒翻了几下，不说话。

小兰走过来低着头望着我说：“死啦？”说罢又开始笑。

我突然一把抓住她的脚腕，她“呀”的一声，挣脱了就跑开了。

我和吴一凡大笑起来。我喜欢看到小兰害羞的样子。

第一步总算成功了，我们到了胡志明市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们被告知休息一天后会送去河内。总算这次是个面包车，小兰身边的位置被吴一凡抢了，我为此耿耿于怀了一下午。